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农民群体可行能力提升研究

张徐林

随着农业农村发展从全面小康向乡村全面振兴进阶,传统意义上对农业农村发展衡量方式的局限愈发显现,当下农民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收入不足,还包括村民自治、发展机会、防护性保障等隐性能力,这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立场一致,该理论突破了传统以收入或效用衡量发展的局限,将关注点置于个体实施各种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实质自由上。在物质条件有所满足的情况下,从农民群体可行能力角度判断农业农村发展进程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一、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应用
阿马蒂亚·森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发展了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该方法聚焦于个体能够获得实质自由及内生发展的机会,力图摆脱传统意义上通过数量、参与人数、满意度等数字衡量资源供给和摆脱贫困有效性的方式。他认为,这种以物质效益为主的衡量方式本质侧重于资源本身,而未明确资源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过多的资源投入并不一定能带来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反而可能会导致享乐主义和“内卷式”竞争。在农民群体中,可行能力理论从群体自身发展视角来看待发展有效性,并作为发展的最根本的超越效用分析的一种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认为效用分析路径不能对快乐、痛苦和欲求进行价值区分,效用并非人生目标的全部,许多其他事物如权利和积极的自由都是有内在价值的,也应该在贫困和福利分析框架中得以体现。对于一种能力的失去,或者用阿马蒂亚·森的语言来说,对于某种可行能力的剥夺所造成的,既是能力的剥夺,也是责任履行上的无能为力,这就是贫困。当然,“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完全否定低收入人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的那种合理的观

点,因为低收入可以是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剥夺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发展就是要破除那些阻碍个人实现工具性自由的障碍,破除这些障碍的能力就是可行能力。

二、拓展农民可行能力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可行能力缺乏在农民群体中的具体表现为内生性能力(思维认知、自由劳动等)和外源性能力(专业技术、社会交往等)不足,这些因素作为农民未来发展的隐性能力而往往被忽视,然而这些因素却并非不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对于农民群体摆脱贫困且获得更具公平性的情绪价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曾经农村发展极不发达,对于内源价值的追求也让位于保障基本生活条件的各种需要,在党和国家20多年的努力下,在全面小康已经实现并完全巩固的情况下,进一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必须要更重视农民自身发展的各种工具性自由,其理由至少有三个:

第一,可行能力提升有助于改善新型农民婚恋状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口回流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而在人口老龄化和适婚青年男女数量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返乡青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等群体的婚恋困境凸显,根据各地开展的调研结果显示,农村青年婚恋困境多是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外部因素不匹配而引起的。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20世纪80-90年代农村青年大多经历了童年时期的贫困、家庭教育的弱化、升学能力不足以及就业竞争压力大等生命历程。这些历程对于他们的性

格产生了特殊影响,一般来说,农村青年由于缺乏足够经济支持和自信,以至于在择偶时更侧重现实性而缺乏理想、浪漫这些柔性因素,这也导致闪婚闪离等现象出现。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纯粹的物质因素已经不足以概括农村适婚青年全部婚恋困境,更具现代化的对情绪价值满足的追求,对爱恋本身而不是婚姻的向往开始在青年群体尤其是女性青年群体中展现出来,这种满足以及获得满足的能力就必然成为改善农村青年婚恋状况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农民可行能力提升有助于改善农业新业态从业者的群体性隔离。正如文化冲突和心理排斥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可行能力贫困的深层诱因,返乡青年以及到农村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乡村CEO等)也面临适应、融入等问题,传统农民的谦逊、保守的品质特征与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新农人在行为处事等方面面临较大差异,提高农民可行能力尤其是思想方式与眼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和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能够有效减少双方不必要的沟通成本。尤其是在基层工作人员的学历快速提升,本科、硕士等中高等教育群体进入到乡村事业发展中,提升农民的信息消化和对外交往能力成为个人发展获取更便捷资源的重要途径。如此,可行能力提升不仅成为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各类群体(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新型职业农民、乡村职业经理人等)交互的良好土壤。

第三,可行能力提升有助于进一步改变传

统意义上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偏见。我国有五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依次划分为士农工商,农民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但在生活水平和经济实力上处于弱势地位,在市场化时代农民又给人以贫穷、落后、素质不高的固有印象,这些都对农村发展以及人口回流有不利影响,根据可行能力理论,提升农民个人的工具性自由,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比如说提高自治参与、提高应对突发状况时的抗风险能力,都能改变农民的传统保守心态,培养出更开放、更有活力的农民群体。

三、农民群体可行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经历了政府财政缺位的阶段、公共财政覆盖阶段,现在走向了城乡一体化的均衡化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有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对农村家庭发展韧性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但是相同的资源投入对不同家庭的可行性明显不同,不同公共服务对农村家庭的可行能力提升也明显不同,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与弱有所扶等公共服务能明显提升农村家庭韧性,提高农村家庭抗风险能力。同时,不同公共服务对于农民个体的可行能力提升也有不同影响,以儿童教育为例,城乡均等的公共服务不仅让农村儿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还能增强其与现代化接轨的能力素质,增强

发展自信以及与孩子儿童的沟通交流能力,这些由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带来的对农民发展隐性能力提升往往被忽略了,这种能力素质提升对进一步促进城乡之间的理解和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具有潜在意义,尤其能够有效遏制贫困代际传承。不仅如此,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金融服务、物流体系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都能有效改善农民群体的获得感,增强其发展潜力。

第二,增强组织建设与政策协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农业农村工作同样如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通过组织建设和政策协同解决农民群体的发展障碍,以期获得更完善的发展机会是农民自身发展的必要路径。村级党组织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桥头堡,也是农民群体获取政策信息、对外沟通交流的官方组织,在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素质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都承担着组织引导的任务。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看,农民个体发展与村集体发展之间是荣辱与共的关系,这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原子式个人,从当前现状来看,农民对于党组织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城市居民,一方面是由于基层自治组织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基层组织是作为农村凝聚力的核心而受到农民的认可,在处理群众纠纷、婚嫁娶等基层事务中发挥客观作用。因此增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农民群体的可行能力。

基金项目:2025年度芜湖市全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科课题“农村公共服务可行能力培育的差异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WXK202520)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南陵县委党校)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思考与探索

卢瑞凤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数字技术为破解传统乡村治理困境提供了新可能。

一、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乡村治理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本质是通过数据要素流通与算法模型应用,打破传统治理时空限制与信息壁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赋能治理主体,促进多元协同与能力提升

1.赋能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是乡村治理的管理主体。一是实现减负增效,如自动化报表、线上审批等将政务人员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从“忙事务”转变为“抓服务”;二是实现科学决策,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对产业发展、公共设施布局、风险防范等进行更科学的规划;三是实现透明行政,如通过“三务”公开平台使村务、财务、党务透明化,减少信息不对称,约束“微权力”。

2.赋能村民。村民是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赋能村民就是让村民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一是畅通参与渠道,通过微信群、小程序、公众号等,村民可以随时随地知情、议事、监督、投诉,实现“指尖上的监督”和“云端上的议事”。二是提升参与能力,通过在线教育、信息推送等功能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三是激发内生动力,村民的意见可通过数字系统被看见、被响应,增强了其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感。

3.赋能社会组织与其他力量。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力量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赋能使他们从“边缘辅助”转变成“深度融合”。比如线上平台,方便外部企业、乡贤、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了解乡村需求,对接资源、参与项目,形成治理合力。

(二)重构治理流程,实现精准化与高效化

1.流程网络化再造。数字技术通过流程数字化与权责透明化,将传统的线下办事流程重构迁移到线上,推动乡村治理流程便捷、主动,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精准识别与定向施策。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

别并了解村民需求,最终主动推送就业、医疗、养老等信息和服务。对垃圾分类、河道治理、宅基地使用等进行数字化巡查和监控,实现问题精准定位和处置。

3.管理闭环与效能提升。数字技术可以形成“信息采集—智能分拨—处理反馈—考核评估”的线上管理闭环机制,大幅提升乡村治理事务的处置效率和问责精准度。

(三)拓展治理时空,实现虚实融合与全天候覆盖

1.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引入数字技术后,治理不再局限于村委会、田间地头,而是延伸至微信群、网络社区等虚拟空间,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治理共同体。

2.全天候响应。数字平台能提供全天24小时不间断服务与监管能力,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

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展现出显著效能,但其赋能过程会受到技术、制度与主体的多重约束。

(一)技术供给与乡村需求的“适配性不足”

当前大部分面向农村地区的数字治理项目存在“硬条件投入、轻场景落地”“重技术展示、轻实际效果”倾向。例如,“数字乡村指挥中心”配备了全套智能大屏与传感器设备,但日常仅用于播放宣传片,基层干部反映“系统操作复杂、数据更新滞后,不如传统台账实用”。根本问题在于技术设计未充分考虑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薄弱、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偏低等因素,技术与需求脱节。

(二)技术的理性特征与人文价值感性特性的冲突

数字技术的“算法”清晰、直接,不带一丝情感,而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有“人情温度”的空间,这样就存在一定冲突,引发治理温度的流失。比如,有些村干部过度依赖系统生成的“风险评分”“治理排名”,忽视对特殊群体如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情感关怀。

(三)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协作容易失衡

数字治理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但实践中常出现“政府热、市场冷、村民被动”的局面。一方面,部分政府将数字乡村建设视为“政绩工程”盲目引进,企业开发成本高且缺乏可持续的运营机制,使高投入建设的“数字平台”

后期沦为“摆设”;另一方面,企业的逐利与公共目标冲突明显。如企业更关注数据变现而非村民实际需求,给一些“智慧村务APP”强制捆绑商业广告,村民缺乏数字技能培训,沦为技术应用的“旁观者”。这种主体间的权责不清与动力差异,阻碍数字治理形成合力。

三、如何让数字技术更有效赋能乡村治理

破解数字技术赋能的现实困境,必须实现技术适配、制度协同、参与主体包容的良性循环。

(一)强化技术适配

坚持乡村需求导向,开发轻量化、简便化的治理工具,如微信小程序版的“村级事务通”,让技术真正贴近村民需求。

(二)完善制度协同

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冲突。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村民满意度、实际问题解决率纳入考核指标,破除“留痕至上”导向,避免形式主义。二是保留必要的“非数字通道”,如线下服务窗口、老年人专线电话,确保技术弱势群体平等享有治理权利,体现“数字包容”的治理温度。

(三)激活主体协同

培育多元共治生态,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赋能、村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协同格局。一是转变政府对应能,从“直接建设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与监督者”。二是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导和强化企业在追求商业价值的同时注重公共利益,如免费给村干部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三是树立村民数字治理的核心主体意识,通过“数字夜校”“田间课堂”等多形式常态化培训,鼓励村民参与线上议事与监督。四是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协助化解矛盾纠纷,形成“技术工具+人文关怀”的治理合力。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平衡好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传统、工具与价值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技术到“赋能”到“善治”的跨越。随着数字乡村、智慧城市与数字中国的深度融合,乡村治理将迎来更广阔的创新空间,实现乡村治理的精准化、高效化、现代化。

(作者单位:中共泽州县委党校)

项目式学习的实践与优化研究

——以冀教版初中英语八上U5L5 A physical work program 为例

王骥腾

一、引言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新课标要求突破传统碎片化知识传授模式,通过真实情境下的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应用能力。项目式学习以“真实任务驱动、自主探究、成果导向”为特征,契合改革方向,成为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方法。冀教版初中英语每单元第五课为Project板块,是项目式学习理念的具象实践。本文以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五课“体力劳动项目”为例,厘清其实施逻辑与育人价值,为提升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二、冀教版初中英语开展项目式学习的意义

一是对接新课标要求。项目式学习是落实2022版英语新课标的关键载体。新课标要求以主题整合语言与文化知识、技能与策略,通过综合实践提升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冀教版每单元Project板块围绕劳动教育、健康生活等主题设计任务,为跨学科实践奠定基础。二是化解传统教学困境。它能破解传统教学学用脱节、知识碎片化难题。以真实问题为驱动,将语言学习嵌入校园生活场景,让学生在“问题分析—小组协作—成果产出”流程中,把碎片化词汇句型转化为可迁移的语言运用能力。三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项目式学习能推动英语学科四大核心素养协同发展。让学生在探究中提升语言表达能力,锻炼批判性思维与协作能力,掌握个性化学习策略,为终身学习奠基。四是助力教师教学转型。它能促使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提升课程设计能力,推动课堂生态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

三、冀教版初中英语项目式学习的实践解构

以冀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五课“体力劳动项目”为例,其项目式学习实施可拆解为熟悉主题、项目启动、项目实施、成果展示四个环节,各环节紧密衔接,层层递进。

(一)熟悉主题,引入项目范本
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Work Education 紧扣劳动教育主题,在新课标中属于“人与自我”范畴下的“做人与做事”主题群,关联“劳动实践、劳动品质与工匠精神”等子主题,旨在帮助学生塑造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价值观念,深化劳动教育内涵。

第五课A physical work program 是一篇体力劳动项目,清晰呈现了校园大扫除项目的核心信息,涵盖主题、时间、劳动工具、参与者分工等细节。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规范设计劳动项目的直观范例,更通过完整框架帮助学生建立项目式学习核心要素的认知。为后续自主学习筑牢基础,也潜移默化传递了“用英语解决真实劳动场景问题”的理念。

(二)启动项目进程,设计驱动问题
熟悉主题、明确框架后,项目启动是项目式学习的首要环节。核心任务是锚定方向、规划路径。教师需深入研读本课内容,提炼核心主题“Designing a Practical Physical Work Program for Our Class”,该主题既承接本单元劳动教育目标,又关联学生校园生活,有效激发探究欲。

设计驱动性问题时,需整合两类资源:一是活动一的表格,它清晰列出项目设计的关键要素,为项目设计提供基础框架;二是活动二的问题链,帮助学生唤醒过往劳动实践经验。据此可设定驱动性问题:“How can we design a class physical work program by using the elements in the pink table(such as time,goals,theme,and task details like tools and roles),and also explain what we can learn from past education programs similar to our past experiences?”该问题既聚焦项目设计,又联结劳动教育意义,助力教学目标达成。

(三)推进项目实施,创设分解任务

项目实施的关键是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主动探索。教师可依托教材校园大扫除场景,关联学生熟悉的班级值日、校园维护等日常经历,创设为班级设计劳动教育项目的真实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

为了让项目推进更顺畅,教师可结合活动三的小组合作项目,将其分解为层层递进的小任务。首先,锚定项目核心要素。引导学生参照活动一表格,围绕项目核心要素展开讨论。其次,开展小组分工协作。以活动三的项目模板为载体进行小组分工:有的构思项目名称与主题(如模仿“Take action! Be a school cleaner!”创作标语),有的规划时间与目的(借鉴“培养学生对体力劳动的热爱与劳动技能”的表述逻辑),有的细化工具使用(如清洁用品收纳)与人员分工(如参考分三组清洁教室、走廊)。最后,联结过往劳动经验。结合活动二问题链,让学生思考如何将过往劳动体验融入设计,让项目更具可行性。

(四)展示项目成果,发展高阶思维

项目成果展示是学生梳理收获、发展高阶思维的重要环节。教师可结合教材活动四“Present your group's program.Vote for the program you like. Carry out the work education program with the most votes.”,组织展评活动,各小组展示设计的班级劳动教育项目,用英语呈现成果。展示过程中,全班学生从项目完整性、英语表达流畅准确性、设计创新性与实践性三个维度投票,并分享投票理由。

四、冀教版初中英语项目式学习的不足及优化建议

(一)课后检测与评价的延续性有待加强

教材Project板块重课堂展示、轻课后巩固与持续评价。以第五单元为例,课堂展示后无配套课后任务强化语言点,对学生合作表现、问题解决能力等缺少长期跟踪,现有单元评价偏向知识考核,难以全面反映综合素养。

对此,可拓展课后延伸与评价维度:针对第五单元,布置“英语劳动日志”任务,让学生用英语记录实践项目片段,巩固语言运用并引导反思;同时制定多维度项目评价表,从语言表达、小组贡献、项目创意、劳动感悟等方面,开展自评、互评与师评,将评价贯穿项目全周期。相关设计可纳入教师用书配套资源,为教学提供参考。

(二)跨学科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拓展

第五课在跨学科融合上有鲜明探索,实现了英语与劳动教育的结合:让学生在校园清洁场景中用英语讨论分工、说明步骤、交流工具使用,真正做到英语服务于劳动实践,双向联动。但这一案例在整套教材中未形成常态化,七、八年级多数单元Project仍局限于英语学科内部,与历史、地理、科学等学科的联系较为薄弱。

建议教材后续修订借鉴第五单元思路,挖掘主题学习与各学科的联结,在相关主题中融入跨学科元素,提升项目式学习的综合实践价值,助力学生多学科视角解决真实问题。

五、结语
本文以冀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五课“体力劳动项目”为切入点,梳理了教材项目式学习的核心价值:通过Project板块落实新课标核心素养要求,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巩固英语能力,融入劳动实践,实现语言学习与劳动素养协同发展,回归英语教学育人本质。教材仍存在评价延续性不足、跨学科融合未常态化等问题。未来期待教材修订补充课后任务与多元评价,挖掘学科间关联;也希望教师灵活运用Project资源,让项目式学习成为连接语言知识与生活实践的桥梁。

(作者单位:河北教育出版社)

政策与院校协同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就业服务优化路径

——基于北京地区高校实践

寇晓丹 牟海波

就业是民生之本。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夯实人才强国建设根基的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新时代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马理论”)研究生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基层党建及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储备人才,其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相关领域的人才供给与发展活力。北京地区不少综合性高校马理论院系依托区域党建资源,在马理论研究生就业服务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在国家就业优先、基层党务人才扶持相关政策指引下,多地院校围绕择业认知错位、专业能力失衡、就业服务滞后三大痛点优化就业工作,并探索构建了适配首都发展需求的研究生就业服务体系,为地方综合性高校提升马理论专业就业质量提供了实践参考。

一、拓展择业新空间,树立正确就业观

依托国家鼓励思政人才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与乡村基层治理等系列扶持政策,近年来,各地持续扩大党务、非公企业党建、基层党校等政策性岗位,不断拓展马理论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但从北京地区高校实践现状来看,目前普遍存在学生择业认知与国家战略需求脱节的问题。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区域内超七成马理论研究生求职首选党政机关、公办中小学思政教师等体制内岗位,热门岗位报考内卷严重,而政策重点引导的基层社区、企业党建、社科研究等领域就业占比偏低,多元化就业渠道拓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第一,部分学生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新兴就业领域缺乏了解,自主择业的选择范围不断收缩;第二,研究生在职业选择中往往期望获得更高薪资,与基层岗位实际薪酬形成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就业选择的矛盾。

与此同时,基层党务招录政策面向高校的宣讲覆盖面不足,各地基层就业补贴、选调优待等利好细则大多只依托官网零散发布,缺少进校园、进课堂的系统化解读,大量扶持政策信息长期存在信息壁垒,学生难以精准掌握基层岗位配套福利、落户优待、薪资补贴等关键内容,进一步加剧学生对基层岗位的认知错位。而择业片面化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学生对专业时代使命与国家用人导向理解不足,形成了择业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高校就业价值引领工作存在短板。立足院校育人职

责,北京地区高校紧扣国家基层人才落地政策要求,重塑学生择业认知。第一,归集岗位信息,拓宽择业视野。学校主动对接各地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持续精准收集各类岗位就业信息,引导学生重点关注政策扶持的基层就业领域,有效拓宽学生自主择业范围。第二,用好榜样育人,端正择业观念。运用优秀毕业生基层就业典型案例,发挥专业教师、辅导员、就业导师的协同引领作用,将就业观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学习与日常思政工作,引导学生树立理性择业理念,助力学生找准适配自身发展的职业方向。

二、优化培养全过程,推动学用深适配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新时代思政队伍建设工程、基层党务工作者规范化建设等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新时代马理论人才既要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也要具备公文撰写、群众工作、思政课讲授等实操本领,对高校研究生培养的实用性、适配性提出硬性规范。然而,当前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存在人才培养与政策用人要求脱节的问题,人才培养偏重理论讲授,实务实训课程偏少,学生在公文写作、基层治理实务等岗位核心技能方面储备欠缺;实习资源多集中于中小学、党政机关、隶属国企、乡镇党校等优质对口实习较为稀缺,学生难以获得实践锻炼机会。

这一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各地基层就业扶持补贴落实不均,部分地区仅用于接收在校研究生实习的专项经费拨付不到位,基层单位因缺乏实习配套经费和人力成本补贴,接收实习生的意愿偏低,直接导致优质基层实训岗位供给持续扩大。另一方面,高校缺乏全周期系统化培养规划,分段能力培养目标不清晰,且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滞后,岗位实践渠道不足。需要强调的是,马理论专业属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序列,若过度侧重职业能力训练,可能会削弱其理论功底。如何平衡理论学习与职业技能培养,成为院校人才培养的难点。

围绕政策人才能力标准,北京地区高校构建全周期分层培养模式,兼顾理论功底与实务培养。第一,分段分层施教,融入岗位实操内容。研一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通过职业测评帮助学生明确择业方向;研二阶段聚焦基层就业基本训练,辅导员岗位实操能力培训以及基层工作实训等方向开展专题活动,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研三阶段则定向推送招聘信息,针对不同就业方向分类开展面试

指导及心理支持。第二,共建实践基地,搭建实训平台。学校一方面整合校内实习岗位资源,让学生获得实践锻炼机会;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基层实习专项经费支持,与社区、街道、党政单位及中小学深度合作,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根据学生择业意向匹配相应岗位。通过校内外联动,缓解基层单位接收实习生的成本压力,实现培养内容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

三、构建服务全链条,实现帮扶精准化

就业优先政策明确要求健全高校精细化就业服务体系,推动高校结合专业特色定制就业帮扶举措。当前,北京地区部分高校就业服务仍以单一转发招聘公告、集中组织校园招聘等传统方式为主,缺少针对马理论专业的专项支持。马理论毕业生就业方向较为多元,公考、思政教师、企业党务、基层选调等方面的备考内容和招录规则差异较大,通用的就业指导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此同时,院校普遍缺少长期的数据追踪机制,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难以回流到学科建设环节,市场岗位需求的变化也无法及时反馈到课程改革中,导致人才培养、就业服务与市场需求脱节,全链条帮扶难以落地见效。

第一,建立动态岗位信息库,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学校依托就业指导中心,按党政机关、中小学思政、国企党建、基层社区等方向分类归集岗位信息,动态更新招录时间、笔试面试要求、薪资待遇等关键内容。同时,利用校友资源拓展内推渠道,每学期向学生定向推送不少于3轮招聘信息,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实施分类分层指导,提供全周期支持。针对学生不同就业意向开设专项辅导,邀请一线骨干教师、组织部干部、国企党务负责人讲授授课;建立一对一导师帮扶机制,从简历修改、模拟面试到心理疏导提供全程陪伴式指导。第三,完善就业跟踪与反馈闭环,反向驱动培养改革。学校建立毕业生就业质量追踪制度,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收集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及用人单位满意度反馈,动态调整培养方案,确保就业服务体系与人才培养改革持续迭代。

通过政策与院校的同频联动,北京地区高校在马理论研究生就业服务领域的实践探索,既破解了当前马理论研究生就业领域的认知错位、能力不适、服务粗放等现实难题,也为地方综合性高校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提升专业人才培养适配性提供了清晰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